

从“国考热”看简政放权的紧迫性

2014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确认已经结束,本月进入倒计时。有媒体统计,这场被称作“中国第一考”的考试,报名人数已由1994年的4400人,增至此次的152万人,20年间涨了300多倍。竞争比例则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

“国考热”近年来持续升温,甚至出现“千人报考一个职位”的拥堵现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不可否认,经由“国考”这样相对更透明、更公平的考录渠道,很多大学生乃至社会在职人员可以顺利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并觉得一条相对理想的上升通道,众多政府机构也可以招揽到优秀的人才。不过,也有专家对此颇多忧虑,

认为大批人才都去挤政府部门,对整个社会的创新、发展活力是不利的。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尽管政府机构一样需要杰出的人才,这些杰出人才的进入也会有效提升政府管理水平,但是,大批优秀人才纷纷去做公务员,并不值得提倡。诚如诺贝尔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所言,年轻人挤做公务员,是浪费教育成本。而且,这种浪费最终还是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上。

“国考”为什么会持续高温?除去就业难、经济形势有待提振以及这条路径确实比较公开和透明这些原因外,更大的吸引力仍在于权力。“一入公门即为官”,很多参加国考的大学生并不讳言这

样的职业愿景。公务员的社会地位较高,各种福利保障也好,特别是在目前,行政权力在各项资源的配置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因此,“国考热”的程度,也与政府简政放权的程度有着关联性。若能够切实搞好政府职能转变,约束权力,将政府手中该放的权力下放给社会和企业,则政府部门的“吸引力”就会相应淡化,众多大学生以及社会在职人员也就不再趋之若鹜地参加“国考”。

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改革应该加快实现从“管制”到“服务”的职能转变,避免随意干预微观经济,更不能想方设法定置门槛,甚至利用、滥用手中的行政

权力,导致推高整个社会的创业成本,妨碍健康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应该厘清权力的边界,以强力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来规范和约束权力。不仅要简政放权,还要形成权责相符、分工合理、运行有序的运转机制,让政府良治和社会自治实现良性互动。

今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简政放权,李克强总理不久前也强调,政府职能转变“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整篇文章做好,更多释放市场活力,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可以说,随着政府权力的逐渐祛魅,整个社会的就业、创业环境转好,相信民众也会越来越理性,不会再蜂拥挤进“国考”考场。

明文

让服务业企业轻装上阵

近年来,服务业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新方向。发达经济体在寻求再工业化、再制造化的同时,着力保持服务业领先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也在着力弥补服务业发展的短板。

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背景下,我国服务业迎头快速发期。2008年至2012年,服务业年均增长率达9.5%,服务贸易增长11.5%。但是,相对于社会需求,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还远远不够。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6%,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就业比重也明显偏低。现代高端服务业,如研发、信息、网络、物流、银行、保险等的发展还很薄弱。而与货物贸易的巨大发展规模相比,我国服务贸易仍然是个短板。

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有认识上的问题、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体制机制的制约。市场化改革滞后,产业化不足,使服务业缺乏动力和活力,高端服务业发展空间受限,高层次服务人才短缺。而国际化水平不高,也使服务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如何尽快补上“短板”?首先是观念要“松动”。服务业的出路在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限度地依法依规为服务业发展“松绑”。

要进一步深化审批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取消和下放涉及服务业发展的各种不必要的投资审批许可制度,让市场机制调节服务业投资和消费,优化服务业资源配置。

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坚决破除各种“玻璃门”和“弹簧门”,坚决打破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服务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把以前由于管制而压抑的增长潜力释放出来。

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思路。要引入有竞争力的投资和经营者,引入新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部门,推动产业升级。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建立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富有吸引力的体制环境。

此外,还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创新融资方式,让服务业企业轻装上阵,充分释放发展潜力和活力。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期,必须用改革的方法、创新的思路来破除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尝试为契机,以服务业的改革带动经济转型,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让创造的活力在改革中竞相迸发,必将迎来服务业的大发展。

李予阳

草根创业精神需要各方呵护

日前,在一场有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出席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与淘宝网创始人马云的一番对话中,透露自己曾有过上淘宝的经历,并且被店主留言感动。淘宝店主何以感动了总理?其中的深意耐人寻味。

从总理的“触网”经历看,淘宝店主的敬业确实令人动容。半夜接到单子就马上送出去,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商业信誉,对客户的要求能迅速回应,非常在乎客户评价,种种细节,反映了店主的勤劳、细心与坚持。而且,这种行为体现在多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身上,更显出创业者们奋斗精神之可贵。

“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梦想”,不久前北京大学起床协会的口号引发了热议。在那些熬夜在线、等候订单的淘宝店主们心中,无疑存在着一个创业梦。梦想不管大小,都要靠扎扎实实的打拼、点点滴滴的积累来实现。在淘宝网每天数以千万计的交易中,有无数店主辛勤操作、热心服务,一个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订单滚雪球般汇成了规模惊人的产业,一个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青年人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中成就了自己。马云在座谈会时,就颇为自豪地提及,现在走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姑娘、小伙子,也许看上去极为普通,但没准他就是淘宝上销售额过5000万甚至过亿元的店主。

从更大社会层面看,“草根创业”的力量已经初步彰显。员工只有2.5万人的淘宝网,但搭建出来的网购平台,却撑起了几百万家网店的经营,带动了上千万人的就业,去年“双十一”创造了单日销售额近200亿元的商业神话。有人不无感叹“沃尔玛忙活半年,不及淘宝折腾一天”。所有这一切,从不同侧面显示了以信息消费为代表的经济内生活力,这正是经济转型升级所希望看到的良性变化,难怪李克强总理对此点赞:创造了一个消费热点。

新经济魅力初展,创业激情还需呵护。如何才能挖掘和发挥年轻人的创业精神?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制度改革,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等限制。这些简政放权的举措,意味着办公司的门槛降低了,创业的成本低了,创业之门向更多人敞开,有利于激发社会创造活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让更多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需要在制度上营造更宽广、更公平的舞台,使普通人的努力获得更为有力的支持。如此,在鼠标点击、手指触动之间,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

陆文江

人民币内贬外升



常听到不少人抱怨:“不是说人民币升值了吗?但我为啥感觉钱越来越不值钱呢?”这里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来解开大家的困惑。李大妈在市场上买大米时,发现此时大米已经是3.30元/斤了,她记得这种大米在2005年为1.90元/斤,因此,可算出该大米的物价指数为1.74,8年间平均每年上涨9.2%。就购买大米的能力而言,与2005年的1000元相比,2013年的1000元已缩水至576元,即人民币对内贬值了。但当李大妈去中国银行购买外汇时,她又看到当前汇率已是6.1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她用1000元可购入162.07美元。她记得8年前1000元人民币只能购得120.77美元。今天,她手中的人民币可换更多的美元,就交换美元而言人民币越来越值钱了。这就是物价上升带来的人民币对内贬值和汇率上升带来的人民币对外升值。

焦海洋/图

50万博士与钱学森之问

35年来培养50多万名博士,这样的培养速度与数量,放之世界范围内,也让人为之惊叹。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在博士数量“赶超欧美”的同时,其质量也参差不齐,这也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50多万名博士的庞大数量,却无法直面回答钱学森之问,这本身也是一种尴尬与困惑。其实,钱学森之问和“博士数量较大但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答案,是相似和一致的。换句话说,释疑50万名博士质量严重不足的现实,与解惑钱学森之问,都是我们教育界和科学界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

当然,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许多学术界人士和社会公众也有诸多解释,诸如学术自由不够、学术环境不够宽松、学术失范事件追究不严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虽然各有不同,但总不外乎对于学术尊严的体认与践行之类。而实现这一点,不外乎两方面要求,一是学界中人,要有孜孜以

据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黄宝印介绍,实施研究生教育35年以来,我国已培养50多万名博士。黄宝印同时强调,我国博士培养面临着规模和数量较大但质量不足的问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11月10日《扬子晚报》)

求的学术精神,二是外部环境,要有利于学术自由的良好氛围。

让人堪忧的是,在目前的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学术失范事件层出不穷,学术权力市场化,甚至出现如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提出的“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学校,在官场”的现象。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或许并不难解,但真正消除隐藏在钱学森之问背后的问题,却绝非易事。这正是我们今天面对决决50多万名博士却质量不足时的苍凉与无奈。各行各业需要大量的人才,但并不意味着代表学术最高水平的博士学位就可以随意宽松出炉,甚至“批量发售”。说到底,损害学术尊严和博士形象的,恰恰是这个群体本身以及背后的体制问题。

我们必须认清“50多万名博士质量不足”的事实,认真梳理和纠正体制中的种种弊端,避免博士学位成为一种镀金经历。只有源源不断地产生高水平的博士人才,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才不会如今天这般变得冷峻与无奈,我们也不至于在数量第一的博士人群面前,缺乏有足够底气的喜悦与欣慰。 邓为

目前全国广场舞爱好者过亿人,主体人群是40岁到65岁的妇女。喜欢的人兴致勃勃,被骚扰的人鸣枪、放鞭炮、泼粪……一些舞友也有苦衷:“跳舞要是听不清音乐,动作难以投入,也就起不到锻炼的目的,而且跳舞的人不少都上了年纪,声音大小根本听不清。”(11月8日《人民日报》官博)

不该让广场舞噪音问题“无解”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围绕广场舞噪音的纠纷呈现激化趋势。因不满邻居跳广场舞噪音而鸣枪泄愤等极端事件的发生,折射出广场舞爱好者和普通居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再次引发人们对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的关注。据报道,在一些城市环保部门接到的噪声污染投诉中,对“广场舞”的噪声投诉名列前茅。

近年来,广场舞因简单易学、节奏感强,成为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健身娱乐方式。其发展速度迅猛,远远超过了公共空间的配给能力,加之城市居住密度本来就高,空间不足和噪声污染的问题双双凸显了出来。据《新京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广场舞是否扰民的问题上,受访者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47.5%的受访者认为“声音大,扰民”,也有51.3%的受访者认为“不扰民,也是一道风景”,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不好说,且91.8%的受访者所在小区有人跳广场舞。

由此可见,在是否扰民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态度分明,且跳广场舞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这充分说明,广场舞和噪音背后的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调和的时候了,不能任其发展。我们应该认识到,面对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解决好广场舞问题就是解决了群众身边的、紧迫的问题,也是用实实在在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一个偶然事件的出现必定含有必然性。受到广场舞干扰的人之所以做出极端行为,往往是遭遇了协调无果、投诉无效,无论是和跳舞者当面交涉,还是向物业或小区管委会沟通,抑或选择报警,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反映出,对广场舞噪音这类新问题的诉求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良性沟通的渠道。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广场舞的群众需求还将日益扩大,划定区域也好,分时段也罢,怎样有效引导和释放这种需求迫在眉睫。同时,要想想方设法给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经济型健身娱乐方式,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避免单一需求过盛,给某种公共设施或局部空间造成不堪重负的巨大压力,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宋华

“世上最难打进去的人工查询电话是96155,北京市住房公积金咨询电话,有谁愿意试试,我已经打了半个小时了。”最近,不少人在网上吐槽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服电话96155,“实在是太难打通了。”记者了解到,每天打进北京住房公积金咨询电话有近万个,而接线的工作人员仅20名。(据人民网)

民生热线难打通需要问责

眼下,不少涉及民生的服务部门,包括住房、教育、社保等等,都设立了专门热线,接受公众的咨询和投诉。不过,这些民生热线实际的运行情况,却不令人满意。

民生热线难打通,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部门相关办事和政策信息公开不细致。浏览许多部门的网站就能发现,许多网站要信息量偏少,比如去政府部门办一件事,具体需要哪些手续,网站往往找不到,必须亲自打电话或到现场去问,才能得到确切答案;要么信息归纳整理没做到人性化,想查询自己的信息,必须从一些复杂的栏目和网页中去寻找,费时费力,其实许多常见、民众咨询较多的问题,完全可以归纳整理做成专门的问答栏目,让人一目了然。

此外,其他便捷有效的咨询渠道太少,使得民生热线不堪重负。许多政府网站上都有咨询邮箱或在线提问等栏目。但是,民众通过这些渠道提问,怎么答复,何时答复,却没有明确的约束性规范,所以现实中,这些渠道几乎形同虚设。而在微博、微信流行的当下,许多政府部门也没积极去运用这些新手段为民服务。实际上,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官方微博,接受网友的在线咨询,有效地缓解了电话热线的压力。

可见,解决民生热线难打通,方法和手段并不复杂,但是,一些政府部门为何就是任由现状持续,而不努力解决呢?表面上,这反映出这些政府部门把为民服务当噱头,缺乏服务民众的诚意,但其实是,相关考核问责制度的缺乏,才是造成这些官僚做派的根本原因。

现实中,一条民生热线开通后,它的运行情况,缺少绩效考核和社会评议。政府部门接待民众咨询和投诉时,具体程序和细节要求,缺少制度的规范,一些办事人员面对民众摆“官老爷”架子,除非媒体曝光,往往不会得到事后的追责。

民生热线问题,是关系民众切身利益,关系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大问题,绝不能轻忽。对此,不妨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每条热线的接通率、排队等候时间、民众满意度如何,都定期拿出来晒一晒。对于政府部门和办事人员敷衍民众、服务质量低的现象,当像企业一样建章立制,明晰相关服务规范,对违规者毫不留情追责。如此,才能保障民众的诉求和利益得到尊重。

韩 灏

银行选才变“选爹”是危险信号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吐槽称银行在招聘过程中,不问能力问关系,有银行的招聘面试官竟直接问:“你父母能拉到存款吗?”

银行“选才”变“选爹”,这种错位的选人标准,是一种危险的社会信号,如任其发展,将会误导人才成长的价值理念,延误企业单位的创新发展,甚至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系。

首先,错位的选人标准将误导人才成长的价值理念。如果一个寒窗苦读的学子求学十数载,毕业求职时被一个又一个的用人单位,用所谓的“关系、背景”等前置条件排斥时,而其他一些年年挂科、“会来事善钻营”的学生因其“有背景、有关系”,被用人单位高看一眼、高薪录用时,这些寒窗苦读的学子会如何着想?

挫败的人生境遇是否会强化他们“学得好不如有个老爸好”的意识?一股无力感、失落感是否会朝朝阳般的年轻人变得暮气沉沉?

其次,错位的选人标准将延误企业单位的创新发展。在效益与生存的背景下,银行招聘一些具有“先天揽储资源”的新员工本无可厚非,但是,事物有

利就有弊,如果过于“依赖揽储、吃利差”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进而形成生存路径依赖,而忽视诸如金融服务、投行业务等方面的开拓创新之举,传统银行只会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边缘化。

从这一层面讲,银行一味招聘“有关系、有背景”的大学生进入单位工作,只会强化自身贫乏的盈利模式。同理,对其他企业单位来说,企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还得靠人才,而不是靠所谓的“关系户”。

再次,错位的选人标准将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一个上下阶层有序流动的社会,才是良性健康的社会生态体系。读书是国人尤其是寒家学子最有可能改变自身命运,进而实现上下阶层流动的手段,如果用单位在寒窗苦读的学子即将进入社会的时候,通过是否“有关系、有背景”等前置手段,把有能力、学生排斥在体系之外,这岂不是不断固化现有的社会贫富关系和阶层分化格局,进而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压抑社会的青春活力。

企业选人,“不问能力、不问关系”,是企业短见的表现,如任其发展,将延缓社会的发展活力,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发展进步。

李平

现在还有没有人看电视

板电脑?还有多少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是通过电脑、平板电脑甚至手机上网浏览新闻而是每晚坐家里守着电视机?面对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浪潮,“新媒体会不会取代电视、报纸、广播”似乎已经不是问题,“何时取代,5年、8年还是10年?”才是问题。事情真会这么发展吗?未必。

笔者得承认:我不年轻了,可也不老,可我还是依然经常打开电视机,我的不少亲友下班回家第一件事,也是开电视,据说全中国有40%的人有这一习惯。那到底每天全中国还有多少人看电视呢?央视索福瑞2001年至2012年的全国电

视开机率数据显示:2001年是21.17%,2009年是23.45%,2012年是23.74%。近年来还略呈上升趋势。

我们不能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还是相信亲眼看到的东西,要从电视上求真相。今年3月至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舆情调查实验室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城市居民舆情调查显示,民众对电视“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占81%,对报纸的信任度大于70%,对网络和广播的信任度分别为55.1%和53.3%。电视还是民众信任度最高的媒体。

广告也许是展示媒体影响力的风向标。百度百科数据显示,2012年广告主营销推广费用紧缩。百度援引昌荣传播的数据说,分媒体来看,电视、广播、互联网等都保持了广告额的增长,电视媒体广告增幅为4.7%,杂志为11.1%,广播媒体为13.5%,互联网为25.7%,只有报纸媒体出现了7.4%的降幅,为近年最大。

央视公布的全广告总额每年都在增长,印证了百度的数据。但是,我们中不少人确实又都把过去看电视的时间分出去一部分,进行别的娱乐:玩手机,玩电脑,玩平板电脑;看电影电视,刷微博,刷微信朋友圈,玩游戏。何海明认为,移动互联网用的时间在上升,但并没有取代电视,它们是并存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边玩新媒体,一边也开着电视。我相信有人是这样的,但有多少人呢?这还真需要另一场大规模的调查来摸清。

文 依